

· 论坛 ·

埃塞俄比亚在推动非洲一体化中的作用^{*}

王玉华 潘 良

内容提要 埃塞俄比亚是非统组织和非盟的总部所在国家，在非统组织和非盟的成立和发展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早期泛非主义萌芽与发展阶段，埃塞俄比亚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深刻影响了泛非主义的发展轨迹。埃塞俄比亚通过成功调解卡萨布兰卡集团和蒙罗维亚集团在非洲一体化问题上的分歧，最终促成非统组织的建立，而且在政治、经济、地区安全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虽然，埃塞俄比亚在非洲一体化中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减弱，但它仍然是支持非盟成立与发展的主要非洲国家之一。总的来看，埃塞俄比亚历届政府都高度重视非统组织和非盟，并在非统组织和非盟的框架内协力推动非洲的发展。

关键词 非洲一体化 埃塞俄比亚 泛非主义 非统 非盟

作者简介 王玉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非盟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天津 300222）；潘良，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非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天津 300222）。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大陆独具特色的国家，拥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古老而独特的文明，是非洲文明古国之一（阿克苏姆王国）。在非洲近代历史进程中，埃塞俄比亚是除美国扶持建立的利比里亚以外，在列强瓜分中非洲所剩的唯一独立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埃塞俄比亚不仅成为联合国创始国之一，而且是万隆会议参与者和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埃塞俄比亚独特的发展史，使其成为泛非主义运动和非洲一体化的重要驱动者，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非洲统一组织（以下简称“非统”）和后来的非洲联盟

* 本文得到南开大学张象教授的指导，特此致谢！

(以下简称“非盟”) 总部所有地。本文拟以埃塞俄比亚为研究视角，尝试回答该国在促进非洲一体化进程中作用议题。

埃塞俄比亚与早期泛非主义运动

从早期的泛非主义运动发展过程看，埃塞俄比亚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Herodotus) 曾将“埃塞俄比亚”指称为埃及以南的地方。在此后很长一段历史中，“埃塞俄比亚”这个词被用于指代埃及文明、腓尼基人文明和罗马非洲文明以南的非洲地区。^① 19世纪中后期，数以百万计的非洲黑奴被运往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充当苦力。由于在文化、肤色和经济方面受到了不平等对待，在19世纪末期，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非洲黑人后裔之间开始形成共同的种族团结意识。这种黑人种族团结意识便是泛非主义思想的历史源头。^② 在泛非主义思想萌发的历史时期，重建黑人种族的尊严和自信成了早期泛非主义者最迫切的渴求。由于“埃塞俄比亚”曾被用于指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圣经》(英王詹姆斯版本)诗篇第68章第31节中提到的“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实人 (Cushites) 要急忙举手祷告 (Princes shall come out of Egypt; Ethiopia shall soon stretch out her hands unto God)。”其中的“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被信奉基督教的非洲黑人以及全世界非洲黑人后裔看作是对非洲的统称。《圣经》中的这句话也被看作是对非洲将得到救赎的预言，成为无数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信仰基督教的非洲黑人及非洲黑人后裔心中的共同希望。^③

巧合的是，正是有着“埃塞俄比亚”之称的信奉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帝国，于1896年3月1日在阿杜瓦战役中战胜了意大利侵略者，成为仅有的战胜西方侵略者并成功维持主权独立地位的非洲国家。在绝大部分非洲地区已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之际，这一历史事件极大地鼓舞了非洲黑人和全世界的黑人后裔。埃塞俄比亚也因此成为独立非洲的象征符号，烙在了每个心系非洲的非洲黑人和世界各地黑人后裔的心中，成为团

^① Clarence G. Contee, “Ethiopia and the Pan – African Movements Before 1945”, *Black World*, Vol. XXI, No. 4, 1972, p. 42

^② Robert Chrisman, “Aspects of Pan – Africanism”, *Black Scholar*, Vol. 4, No. 10, 1973, p. 3.

^③ Ibid. , p. 3.

结世界各地黑人及黑人后裔的精神纽带。^①

阿杜瓦战役后，埃塞俄比亚成为许多早期泛非主义者心中的圣地。许多美国和加勒比地区的黑人都曾在阿杜瓦战役后到访过埃塞俄比亚，其中不乏为泛非主义运动做出杰出贡献的先驱者们，1897 年，出生于海地的贝尼托·西尔万（Benito Sylvain）怀着朝圣般的敬意来到埃塞俄比亚，请求国王孟尼利克二世领头创建一个国际黑人组织，帮助黑人种族摆脱被压迫的命运。虽然没能实现他的目的，西尔万还是在埃塞俄比亚逗留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他曾在孟尼利克二世身边担任过一个类似于随从武官的职位。^② 1900 年，在亨利·西尔维斯特·威廉斯（Henry Sylvester Williams）和西尔万等泛非主义先驱们的推动下，泛非会议（Pan – African Conference）在伦敦召开。西尔万以埃塞俄比亚孟尼利克二世皇帝随从武官的身份代表埃塞俄比亚出席了这次会议，孟尼利克二世被推举为泛非协会（Pan – African Association）的荣誉主席之一。^③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亨利·西尔维斯特·威廉斯作为会议的主人之一正式阐述了泛非主义这一概念。^④ 此外，另一个访问过埃塞俄比亚的泛非主义者，便是曾经担任过孟尼利克二世医师的约瑟夫·维托利恩（Joseph Vitalien）。在 1919 年由杜波依斯组织的第一届泛非大会上（Pan – African Congress），埃塞俄比亚的象征性参与便是由维托利恩来完成的。^⑤

埃塞俄比亚在阿杜瓦战役中的伟大胜利也对泛非主义运动的两个主要领袖人物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和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产生了深刻影响。在 1900 年的伦敦泛非会议上，有着“泛非主义运动之父”之称的美国黑人知识分子杜波伊斯撰写了有名的“致世界各国（Adress to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这一泛非主义宣言。在宣言中，杜波伊斯将埃塞俄比亚称为启发泛非思想的源泉。杜波伊斯后来在 1919 ~ 1927 年先后组织了 4 届泛非大会

^① Paulos Milkias & Getachew Metaferia eds, *The Battle of Adwa: Reflections on Ethiopia's Historic Victory against European Colonialism*, New York: Algora Publishing, 2005, p. 10.

^② Getachew Metaferia, “Ethiopia: A Bulwark against European Colonialism and Its Role in the Pan – African Movement”, in Paulos Milkias & Getachew Metaferia eds. , op. cit. , p. 203.

^③ Clarence G. Contee, op. cit. , p. 45.

^④ Ronald W. Walters, *Pan – Africanism in the African Diaspora: An Analysis of Modern Afrocentric Political Movements*, Detroit: Wayn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pp. 43 – 44; J. M. Biswaro, *The Quest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Rhetoric Versus Reality – A Comparative Study*, Dar es Salaam: Mkuki na Nyota Publisher, 2012, pp. 292 – 293.

^⑤ Clarence G. Contee, op. cit. , p. 79.

埃塞俄比亚在推动非洲一体化中的作用

(Pan – African Congress)，极大地推动了泛非主义运动的发展。^① 另一个泛非主义运动的领袖马库斯·加维也常常在他的演讲和文章中提到埃塞俄比亚。在他的全球黑人进步协会（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的会歌中，马库斯·加维甚至将埃塞俄比亚作为“泛非”的代名词。^②

如果说埃塞俄比亚在第一次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战争的阿杜瓦战役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促进了泛非主义运动的兴起，那么 1935 年意大利发动的对埃塞俄比亚的第二次侵略战争则是对泛非主义理想和希望的践踏，而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对意大利的纵容和不作为更是刺激了黑人的团结和斗争意识。当时，杜波伊斯就表达了这种反殖民主义的思想情结，他说：“与殖民地非洲的其他国家不同，埃塞俄比亚……思想比较自由，保持着政治自治，开始重新推行自己的传统政策，在许多方面成为那些可能受到现代性冲击和种族歧视影响的地方人们的榜样。”^③ 据克拉伦斯·G. 康特（Clarence G. Contee）称，1935~1936 年间，非洲黑人和其他世界各地的黑人后裔曾给埃塞俄比亚《观察者》（1959 年）主编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写了数千封信，表示他们对埃塞俄比亚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在埃塞俄比亚被意大利占领的 5 年时间里（1936~1941 年），泛非主义者们在英国伦敦和尼日利亚的首都拉各斯召开了大量的带有泛非性质的抗议性会议。克拉伦斯认为正是这些会议为 1945 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第五次泛非大会奠定了基础。

第五届泛非大会结束后，泛非主义运动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推动非洲历史进步的主要力量。在这股非洲解放运动和泛非主义运动齐头并进的历史洪流中，我们也能看到埃塞俄比亚的身影。1958 年 12 月，埃塞俄比亚以筹备委员会成员的身份组织并参与了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举行的第一届全非会议，并与其他 28 个非洲独立国家和殖民地的政府或独立运动组织一同商讨了在特定情况下使用暴力反抗殖民统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共同发出了团结一致反对西方殖民统治和新殖民主义的有力号召，并给予了阿尔及利亚和喀麦隆人民的独立斗争有力的声援。埃塞俄比亚也是第二届

^① George Shepperson and St. Clare Drake, “The Fifth Pan – African Conference, 1945 and the All African People’s Congress, 1958”, *Black Studies*, Vol. 8, Article 5, 1986, p. 37.

^② Ibid. , p. 79.

^③ W. E. B. Dubois, “Inter – racial Implication of the Ethiopian Crisis: A Negro View”, *Foreign Affairs*, No. 1, October 1935 , pp. 85 – 86.

(1960年1月)和第三届全非会议(1961年3月)的参与者,在促进非洲团结,推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等领域做了不懈的努力。^①

此外,埃塞俄比亚还曾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提供军事训练。著名的南非黑人解放运动领袖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就是在埃塞俄比亚接受过军事训练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之一。1962年,曼德拉秘密离开南非前往埃塞俄比亚,并在那里接受了专业的军事训练。据新闻资料称,海尔·塞拉西皇帝还曾授命主管军事训练的埃塞俄比亚军官赠送给曼德拉一把手枪以示支持。^②曼德拉返回南非后,继续领导南非黑人反抗白人统治斗争,为最终推翻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埃塞俄比亚也从中提升了其在非洲大陆的影响。

由此,正是基于埃塞俄比亚与大多数非洲国家迥异的发展史,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早期泛非主义运动,尤其是在贡献泛非主义思想源泉方面,深刻影响着泛非主义发展轨迹。

埃塞俄比亚与非统

随着泛非主义运动在非洲的深入发展,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开始迎来高潮,仅1960年就有17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然而,随着越来越多非洲国家取得独立,非洲大陆内部泛非运动也逐步分化成两个集团——蒙罗维亚集团(Monrovia Group)^③和卡萨布兰卡集团(Casablanca Group)。^④在非洲一体化

① Immanuel Wallerstein, *Africa: The Politics of Uni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pp. 30–35.

② See “South Africa Commends Ethiopia’s Role in its Liberation Struggle”, *Daily Ethiopia*, 28 April 2009; Paul Simao, “Mandela’s Gun: The Gun that Emperor Haile Selassie Gave Dr. Nelson Mandela”, *Reuters*, 23 June 2006, <http://www.africaresource.com/rasta/sesostris-the-great-the-egyptian-hercules-mandelas-gun-the-gun-that-emperor-haile-selassie-gave-dr-nelson-mandela/>, Clarence G. Contee, 2012–10–24.

③ 1960年,12个原法属殖民地国家在刚果(布)成立布拉柴维尔集团(Brazzaville),又称非洲和马达加斯加国家联盟(Union of African and Malagasy States)。该成员国都是原法属殖民地国家,且都接受法国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布拉柴维尔集团有着明显的亲西方尤其是亲法国的倾向。卡萨布兰卡集团成立后不久,布拉柴维尔集团和尼日利亚、利比里亚以及其他较为中立的非洲国家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组成了蒙罗维亚集团。

④ 1961年,埃及、加纳、几内亚、马里、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等受东方阵营影响较大也较为激进的非洲国家在摩洛哥的首都成立了卡萨布兰卡集团。See Godfrey Mwakikagile, *Africa After Independence: Realities of Nationhood*, New Africa Press, 2009, p. 101.

埃塞俄比亚在推动非洲一体化中的作用

问题上，前者主张实行经济一体化，但反对建立联邦政府；^① 后者则主张以联邦制的模式建立一个“非洲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frica）”。^② 而且，蒙罗维亚集团认为卡萨布兰卡集团的提议太过激进，不适合非洲的实际情况。因此，双方在成立非洲一体化政府问题上的分歧给泛非主义理想的实现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调解两个集团之间分歧成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此时，埃塞俄比亚因其积极参与非洲地区事务，在非洲大陆拥有重要地位。1960年7月4日，新获得独立的刚果（后改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了针对比利时军官的军事哗变。比利时以保护欧洲人的生命和财产为由派军队进入刚果，导致刚果危机进一步加剧。应刚果总理卢蒙巴（Patrice Lumumba）的要求，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比利时军队撤出刚果并决定向刚果提供军事援助帮助刚果维持国内秩序。埃塞俄比亚响应联合国的号召派遣了3 000多名士兵参加联合国刚果维和部队，并向联合国军队提供了4架战斗机，为联合国维和部队在刚果危机中发挥作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③ 此外，埃塞俄比亚还是联合国于1961年创立的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国之一。因其积极支持非洲人民反殖民主斗争，从而得到泛非主义者的认可。加之，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吸取1935年意大利侵略战争的教训，认为在缺乏有效机制保障的情况下，像国际联盟这样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也往往沦为大国博弈的舞台，落后国家的主权很难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这也成为海尔·塞拉西皇帝支持泛非主义运动和非洲一体化、极力推动成立非洲国家自己的全非洲政治组织的重要原因。其实，早在1961年11月召开的第11届联合国大会上，埃塞俄比亚就曾提出成立一个由非洲国家组成的政治组织的倡议，^④ 只是由于当时非洲各立场不一致，这个倡议没能得到落实。但是，埃塞俄比亚并没有放弃这样的想法。在此主客观条件下，埃塞俄比亚设法弥合蒙罗维亚集团和卡萨布兰卡集团的分歧，斡旋与协调双方立场与观点，大力

^① Paul G. Adogamhe, “Pan – Africanism Revisited: Vision and Reality of African Unity and Development”, *African Review of Integration*, Vol. 2 No. 2, July 2008, p. 8.

^② Godfrey Mwakikagile, *Africa After Independence: Realities of Nationhood*, New Africa Press, 2009, p. 102.

^③ See Catherine Hoskyns, *The Congo since Independenc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211.

^④ David H. Shinn & Thomas P. Ofcansky, Clarence G. Conte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Ethiopia*,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4, p. 15.

推动非洲一体化进程，海尔·塞拉西皇帝遂成为非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1962 年 1 月，卡萨布拉卡集团和蒙罗维亚集团分别向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发出邀请函，邀请埃塞俄比亚参加他们拟定召开的首脑会议，以争取埃塞俄比亚的支持。经过深思熟虑，塞拉西皇帝做了一个既有利于埃塞俄比亚的国家利益、也有利于当时形势的选择——接受蒙罗维亚集团的邀请。^① 塞拉西皇帝随即派遣他的外交部长卡特玛·伊弗鲁（Ketema Yifru）作为埃塞俄比亚的代表参加了于 1962 年 1 月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举行的蒙罗维亚集团峰会。卡特玛·伊弗鲁在峰会上施展外交手腕，成功取得了在埃塞俄比亚举办 1963 年蒙罗维亚集团峰会的机会。塞拉西皇帝本人也特地抵达拉各斯，并发表演讲，强调卡萨布兰卡集团和蒙罗维亚集团之间的分歧并没有看起来那么严重，为日后埃塞俄比亚从中协调两个集团的分歧做了铺垫。^②

获得第二届蒙罗维亚集团峰会的举办权之后，埃塞政府开始着手准备将原本仅限于蒙罗维亚集团成员国参加的峰会扩大为所有独立非洲国家参与的全非峰会。为争取卡萨布兰卡集团的参与，塞拉西皇帝接受了外交部部长卡特玛·伊弗鲁的建议，邀请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访问埃塞俄比亚，共同商讨此事。1962 年 6 月 28 日，经过塞拉西皇帝和塞古·杜尔总统的协商，双方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承诺支持于 1963 年 5 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一次全非峰会。^③ 此后，埃塞俄比亚和几内亚开始分别对两个集团进行游说，并最终得到了所有非洲国家的支持。^④

1963 年 5 月 22 日，由 32 个非洲国家的部长或政府首脑参加的首脑会议正式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塞拉西皇帝被推举为首届非洲国

^① 由于蒙罗维亚集团在国家数量上远大于卡萨布兰卡集团，选择卡萨布兰卡集团不仅不利于埃塞俄比亚的国家利益、也不利于后来埃塞俄比亚开展后期的调解工作。虽然表面上埃塞俄比亚接受了蒙罗维亚集团的邀请站在了蒙罗维亚集团这一边，实际上埃塞俄比亚已做好调解两个集团的分歧并促成双方在非洲一体化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准备。

^② Makonnen Ketema, “The Creation of the OAU”, http://www.oau-creation.com/creation_of_the_oau_1.htm, 2012-10-24. 这篇文章的作者马科宁·卡特玛（Makonnen Ketema）的父亲是海尔·塞拉西皇帝的外交部长卡特玛·伊弗鲁（Ketema Yifru）。作为海尔·塞拉西的外交部长，卡特玛·伊弗鲁是帮助海尔·塞拉西皇帝组织第一次非洲独立国家首脑大会并将非统组织的总部确立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主要历史功臣。由于本篇文章是作者基于卡特玛·伊弗鲁的口述历史资料和珍贵的历史档案所写的，其内容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和历史价值。——笔者注

^③ Yitzhak Oron ed., *Middle East Record*, Volume 2, 1961, p. 477.

^④ See Makonnen Ketema, “The Creation of the OAU”, http://www.oau-creation.com/creation_of_the_oau_2.htm, 2012-10-24.

埃塞俄比亚在推动非洲一体化中的作用

家首脑会议的主席。在会议上，非洲国家首脑们召见了作为部长级会议主席的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部长卡特玛·伊弗鲁，要求其再次召开部长级会议，草拟一份非统组织最终宪章以供各国首脑签字生效。5月25日，非洲独立国家首脑大会最终审议并通过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决定成立非统组织，并将每年的5月25日定为非洲解放日。大会还决定由埃塞俄比亚政府负责设立非统组织临时秘书处，负责执行首次首脑会议的决议，将总部所在地设在亚的斯亚贝巴市，且相关费用由埃塞俄比亚一并承担直至非统组织永久秘书处正式成立为止。^①后来，经过投票表决，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成为非洲统一组织的总部所在地，并被誉为非洲的“外交首都”。

由此，埃塞俄比亚不仅成为非统组织的创始国，而且自非统组织自1963年成立后，积极支持非统组织的发展，做出了务实性贡献：第一，在政治方面，大力配合非统组织，支持非洲解放运动。非统组织对非洲发展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它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作用。早在1963年5月举行的第一届非洲独立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非统组织的创始者们便一致决定在非统组织的框架下设立非洲解放委员会，赋予了非洲解放委员会领导和推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历史使命。此后，非统组织一方面通过政治动员和舆论宣传鼓舞和声援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另一方面以非洲解放委员会为平台，敦促非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向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提供经济、医疗、和军事等方面的援助，有力地推动了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为非洲解放事业的最终实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②对于上述动议，埃塞俄比亚积极投身其中，该国是首届非洲独立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成立的非洲解放委员会委员，也是非统组织非洲解放委员会的行动决策者之一。在非洲解放委员会正式解散之前（1994年），始终肩负着协调非洲各立场、为非洲解放运动提供资金和物质支持、参与管理和监督非洲解放基金使用的重要使命。^③此外，为了支持非统

^①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OAU), Special Resolution in Resolutions Adopted by the First Conference of Independent African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Held in Addis Ababa, Ethiopia from 22 – 25 May 1963, African Union Library and Archival Unit , CIAS/Res. 1/Rev. 1, May 1963.

^② 刘鸿武、罗建波：《一体化视角下的非洲历史变迁》，载《西亚非洲》2007年第5期，第8页。

^③ OAU, Resolutions Adopted by the First Conference of Independent African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Held in Addis Ababa, Ethiopia from 22 – 25 May 1963 , African Union Library and Archival Unit , CIAS/PLEN. 2/REV. 2 A – F, CIAS/Plen. 3 A – C, CIAS/RES. 1/REV. 1 , CIAS/Res. 1/Rev. 1 , CIAS/Res. 2, May 1963.

组织争取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民族独立，埃塞俄比亚曾于 1965 年和利比里亚一起向联合国国际法庭提出申诉希望得到后者的支持。^① 虽然提议最终没能得到通过，但该事例却是埃塞俄比亚支持非统组织在促进非洲独立解放方面所作出的努力的又一有力证明。1984 年，门格斯图在担任非统组织主席时，也曾极力呼吁非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向非洲解放运动组织提供援助。^②

第二，向非统组织提供经费支持。虽然非统组织宪章明确规定，非统组织成员国需按比例承担非统组织的运行经费，但相当一部分非洲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拖欠经费问题。从 1965 年非统组织秘书处正式成立后到 1974 年塞拉西皇帝被推翻的 9 年时间里，包括阿尔及利亚、布隆迪等 20 个非统组织成员国总共拖欠了 138.8 万美元。^③ 到了 1999 年 12 月，这一数字则增加到 3390 万美元左右。^④ 在 1993/1994 财政年度，非统组织原定的 2 476 万美元的财政预算中最终仅有 393 万美元得到落实，不及预算总额的 16%。^⑤ 经费缺乏已经严重阻碍了非统组织发挥作用。对此，作为众多非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在履行其作为非统组织总部所在地国家和非统成员国的义务上，埃塞俄比亚却可谓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楷模。从 1963 年 5 月至 1965 年，埃塞俄比亚一直独自承担着非统组织的临时秘书处的所有费用支出。^⑥ 非统秘书处正式成立后，埃塞俄比亚也一直严格依照非统组织所规定比例按期缴纳成员国经费。从 1965 年至 1974 年，即塞拉西皇帝时期，埃塞俄比亚每年都按时向非统组

① OAU, Resolutions and Declarations Adopted by the Fourth Ordinary Session of the Assembly of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Held in Accra, Ghana From 21 to 26 October 1965 , African Union Library and Archival Unit , AHG/Res. 25 (II) – AHG/Res. 45 (II) , October 1965.

② Kwamina Panford,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to the African Union”, in Kwadwo Konadu – Agyem & Kwamina Panford eds. , *Africa’s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Pertinent Socio –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Issues* ,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6 , p. 73.

③ OAU, Consideration of the Financial Report of the Financial Year 1973/1974 , African Union Library and Archival Unit, CM615 (XXIV) , February 1975.

④ OAU, Statement of Contributions and Arrears of Member States as at 31 January 2000 , African Union Library and Archival Unit, CM/2130 (LXXI) , March 2000.

⑤ Kwamina Panford, op. cit. , p. 73.

⑥ OAU, Resolutions and Declarations Adopted by the Firth Ordinary Session of the Assembly of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Held in Cairo, UAR, from 17 to 21 July 1964 , Ghana From 21 to 26 October 1965 , African Union Library and Archival Unit , AHG/Res. 1 (1) – AHG/Res. 24 (1) , July 1964.

织缴纳会员国经费，从无拖欠。^① 塞拉西皇帝被推翻后，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军政府也很快就宣布新政府将继续保持塞拉西时代的外交政策^②并继承了每年向非统组织足额缴纳会员国经费的良好传统。^③ 进入 90 年代以后，非统组织财政困难愈加窘迫。1993 年 6 月，时任总理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在开罗举行的第 59 届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上，对非统组织的财务困境表示强烈不满，并呼吁非洲各国履行他们作为非统组织成员国缴纳经费的义务。对于常常因为多数成员国不履行缴纳经费义务而时常陷入财务困境的非统组织来说，埃塞俄比亚的支持不仅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其他非洲国家履行对非统组织会员国义务起着模范和带头的作用。

第三，在维护非洲的稳定和团结方面，埃塞俄比亚也在非统组织框架内做不懈努力。这可以从诸多事例中得到证实：其一是主持协调 1967 年尼日利亚内战。为调解尼日利亚内部矛盾，维护尼日利亚的统一和领土完整，非统组织在 1967 年 9 月举行的第 4 届首脑大会上，通过决议决定派遣一支由埃塞俄比亚、喀麦隆、刚果（金），加纳、利比里亚、尼日尔等六国首脑组成的顾问团访问尼日利亚政府首脑，以帮助协调尼日利亚内部矛盾。^④ 此后，非统还特别成立了一个尼日利亚顾问委员会，并授命塞拉西皇帝担任委员会主席主持协调工作。虽然尼日利亚顾问委员会未能彻底有效解决尼日利亚的内部矛盾，但塞拉西为此做出的努力却得到了尼日利亚政府的充分肯定和称赞。^⑤

其二是埃塞俄比亚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表现。1973 年 10 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北非阿拉伯国家在非洲发起了针对以色列的外交攻势，不少非洲国家因此公开指责以色列占领埃及领土。由于埃塞俄比亚在历史上和犹太

① OAU, Financial Report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for the Financial Year 1974/75 as Presented to the Board of External Auditors, African Union Library and Archival Unit, CM/686 (XXVI), February 1976.

② “Guidelines For Foreign Policy Given Here”, *The Ethiopian Herald*, September 13, 1974.

③ OAU, Financial Report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for the Financial Year 1978/79 as Presented to the Board of External Auditors, African Union Library and Archival Unit, CM/1004 (XXXIV), February 1980.

④ OAU, Resolutions and Declarations Adopted by the Fourth Ordinary Session of the Assembly of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Held in Kinshasa, Congo, from 11 to 14 September 1967, African Union Library and Archival Unit, AHG/Res. 49 (IV) – AHG/Res. 52 (IV) & AHG/St. 1 (IV) and AHG/St. 2 (IV), September 1967.

⑤ Gemuh E. Akuchu,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Unsolved Problem for the OAU (A Case Study of the Nigeria – Biafra Conflict)”, *Africa Today*, Vol. 24, No. 4, p. 39.

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当时塞拉西皇帝与以色列有密切关系^①，由此成为北非阿拉伯国家的众矢之的。利比亚甚至借机公开反对亚的斯亚贝巴继续作为非统组织的总部所在地，为平息阿拉伯国家的怒气和维护非洲国家之间的团结，塞拉西皇帝于 1973 年 10 月 23 日忍痛宣布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②

其三是调解乍得内战。20 世纪 80 年代初，非洲各国在西非问题和利比亚介入乍得内战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非洲国家之间的团结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甚至利比亚在 1982 年 8 月和 11 月两次提出在的黎波里举行非统首脑会议的提议都因为遭到了部分非洲国家的抵制而流产。^③ 1982 年也因此成为非统成立后唯一没有举行首脑会议的一年。在此背景下，非洲国家领导人提议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下一届首脑会议，并由埃塞俄比亚领导人门格斯图担任 1983 年非统主席。1983 年 12 月，为调解乍得内战问题，门格斯图还曾号召乍得内战双方举行会谈，以谈判的形式解决乍得问题，但这个提议后来因为遭到哈布雷（Habre）的抵制而流产。^④ 虽然门格斯图最终没能实现他的目的，但埃塞俄比亚临危受命肩负起维护非洲团结的使命也在客观上巩固了它在非统组织中的地位。从 1983 年至 1990 年门格斯图军政府倒台的前一年，历届非统首脑会议都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

综上，埃塞俄比亚借助非统组织推动非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是与非统的发展目标相协调一致的。在非统组织存续的近 40 年时间里，其在促进非洲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维护非洲国家团结等方面所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① Michael B. Bishku, “Israel and Ethiopia: From a Special to a Pragmatic Relationship”, *Conflict Quarterly*, Spring 1994, pp. 40 – 54. 埃塞俄比亚与以色列民族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系王朝的皇族们一直认为他们是示巴女王（Queen of Sheba）和以色列王国的所罗门大帝（King Solomon）的后代（尚无确凿历史考证）。就连海尔·塞拉西皇帝本人的头衔中都带有明显的犹太元素——“Conquering Lion of Judah（犹太族的雄狮）”。此外，以色列为海尔·塞拉西皇帝提供了不少经济和军事援助。可想而知，对海尔·塞拉西皇帝来说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是一个多么困难的抉择。

② Arka Abota, op. cit., pp. 99 – 100. 以色列在当时为埃塞俄比亚提供了不少经济和军事援助。此外，埃塞俄比亚与以色列民族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系王朝的皇族们一直认为他们是示巴女王（Queen of Sheba）和以色列王国的所罗门大帝（King Solomon）的后代（尚无确凿历史考证）。就连海尔·塞拉西皇帝本人的头衔中都带有明显的犹太元素——犹太族的雄狮（“Conquering Lion of Judah”）。

③ Robert Bruce St. John, “The Libyan Debacle in Sub – Saharan Africa, 1969 – 1987”, in Rene Lemarchand, ed., *The Green and the Black: Qadhafi’s Policies in Af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33.

④ David A. Korn, *Ethiop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Croom Helm, 1986, pp. 113 – 114.

埃塞俄比亚在推动非洲一体化中的作用

非统组织之所以能够经受住种种挫折的考验、在非洲历史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与包括埃塞俄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其中，埃塞俄比亚发挥了特殊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埃塞俄比亚在塞拉西皇帝、门格斯图军政府和梅莱斯执政时期都对非统组织的发展做出过积极的贡献，但在这3个时期，埃塞俄比亚在非统组织中的地位和对非统组织事业发展的贡献却显示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从1963年非统正式成立到2002年非盟诞生的这段时期里，埃塞俄比亚经历了两次政权更迭，在非统组织内部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受到了不小的影响。由于塞拉西在非统组织成立过程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以及亚的斯亚贝巴为非统组织总部的所在地，塞拉西执政时期的埃塞俄比亚在非统组织事务中长期处于核心地位。除了在1963年承办了最终催生非统组织成立的非洲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外，塞拉西皇帝在被推翻之前，在亚的斯亚贝巴先后承办了6次非统组织首脑会议，并两次担任非统主席（1963年和1965年）。^①1974年9月，塞拉西一世被埃塞俄比亚革命运动推翻，新成立的埃塞俄比亚临时军政府随即全面接管了埃塞俄比亚外交事务。埃塞俄比亚在非统组织内部的地位和影响力也随着塞拉西皇帝的离去则大打折扣。在1975年至1981年这段长达7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一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在埃塞俄比亚召开。直到1983年，门格斯图才借助1982年卡扎菲受西非问题和乍得问题影响未能如期举办非统首脑会议的机遇，争取到了在亚的斯亚贝巴举办非统首脑会议的权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埃塞俄比亚在非统组织中的地位。此后直到1990年门格斯图军政府被推翻前一年，非统组织所有的首脑大会都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此间，由于非统开始实行首脑会议轮流承办制度，从1991年埃塞俄比亚过渡政府成立到2002年非统组织举行最后一次首脑会议，埃塞俄比亚此间仅仅在1995年承办过一次非统组织首脑会议。

埃塞俄比亚与非盟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非洲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纳米比亚的独立（1990年）和新南非的建立（1994年），非统组织促进非洲解放的历史使命终

^① 这6次会议分别是于1966年、1969年、1970年、1971年、1972年和1973年举行的非统首脑会议。海尔·塞拉西皇帝还曾在1966年的非统首脑会议上再次担任非统主席。

于完成。但与此同时，非统组织在解决区域冲突，维护非洲和平稳定，促进非洲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缺陷也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1999 年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尼日利亚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举行的首脑会议上提出审议非统组织宪章和改革非统组织的提议。卡扎菲也借机在大会上提出在利比亚苏尔特召开第四届非洲国家和政府首脑特别大会，修改非统组织宪章强化非统组织职能的提议，并得到大会的通过。1999 年 9 月 9 日，在卡扎菲的极力推动下，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利比亚苏尔特召开了第四届非洲国家和政府首脑特别会议。会上，埃塞俄比亚对《苏尔特宣言》投了赞成票，为《苏尔特宣言》最终得到 2/3 的多数支持票（36 票）而获得通过提供了有力支持。由此，会议投票通过了《苏尔特宣言》，决定成立非洲联盟。^① 2001 年 3 月 14 日，埃塞俄比亚正式签署《非洲联盟组织法》，并向非统组织递交了批准书，是第 32 个签署《非洲联盟组织法》并递交批准书的非洲国家。^② 《非洲联盟组织法》是 2000 年 7 月在多哥首都洛美市举行的第 36 届非统组织首脑大会上获得通过的。^③ 2002 年 7 月，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南非德班举行非盟成立庆典，正式宣布非盟诞生。非盟从此取代非统组织成为非洲联合自强和非洲一体化梦想的新载体，登上了 21 世纪的国际政治舞台。

纵观非盟十年发展史，埃塞俄比亚在其中的作用虽不及非统时期的独树一帜，但余威犹在，仍然发挥着自身的作用。第一，支持与推动“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是非洲国家自主制定的第一个全面规划非洲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蓝图，它由南非前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的“千年非洲复兴计划”和塞内加尔阿卜杜拉耶·瓦德（Abdoulaye Wade）的“欧米茄计划”的合并体“新非洲倡议计划”发展而来，其宗旨是解决非洲大陆面临的包括贫困加剧、经济落后和被边缘化等问题。^④

^① OAU, Sirte Declaration, African Union Library and Archival Unit, EAHG/Draft/Decl (IV) Rev. 1, 8–9 September 1999.

^② “Ethiopia Ratifies Constitutive Act of African Union”, People’s Daily, March 14, 2001, http://english.people.com.cn/english/200103/14/eng20010314_64947.html, 2012-10-26.

^③ OAU, Declarations and Decisions Adopted by the Thirty – sixth Ordinary Session of the Assembly of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African Union Library and Archival Unit , AHG/Res. 25 (II) – AHG/Res. 45 (II) , October 1965.

^④ NEPAD Official Website, “History”, <http://www.nepad.org/history>, 2012-10-27.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代表了非洲长期发展规划。2002年7月，非盟正式取代非统后，已成为非洲联合发展的新起点，它表明非洲的团结与合作已从政治领域发展到全面合作，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已提上首要日程。“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由此成为非盟推动非洲实现经济一体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规划。^① 虽然埃塞俄比亚不是“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创始国，但它在其中却有着重要的地位。从2007年到2011年，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梅莱斯一直是“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肩负着推动非洲战略合作伙伴计划的实施和发展，司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执行委员会日常工作的重大使命。^②

第二，协力支撑非洲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和作用，防止非洲大陆被边缘化。埃塞俄比亚充分利用其作为非洲区域大国之一和非盟总部所在地之地利，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维护非洲国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一致立场，以期更好地争取和维护非洲国家的利益。作为非洲战略合作伙伴计划执行委员会主席，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代表非洲国家参加八国峰会（G8）和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为加强非洲与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合作和争取外部经济支持做了不懈的努力。^③ 2009年7月，在意大利举行八国集团峰会前夕，埃塞俄比亚前总统梅莱斯·泽纳维曾致信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信中针对即将到来的八国峰会向奥巴马提出意见，其核心是希望八国集团在会上致力于敦促二十国集团落实他们之前向贫困国家承诺的各类援助。^④ 梅莱斯·泽纳维还曾借参加2010年于墨西哥洛斯卡沃斯（Los cabos）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国峰会的机会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公平对待世界各国，尤其是非洲国家。^⑤ 此外，埃塞俄比亚还被非盟授命参加2009年于哥本哈根举行的全球气候峰

① 安春英著：《非洲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页。

② NEPAD Official Website, “The NEPAD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Implementation Committee”, <http://www.nepad.org/hsgoc-0>, 2012-10-27.

③ G8 Website, “Dialogue with Africa”, <http://www.g-8.de/Webs/G8/EN/G8Summit/Participants/OutreachAfrica/outreach-africa.html>; University of Toronto Website, “G20 Toronto Summit Participants”, <http://www.g20.utoronto.ca/2010/to-participants.html>, 2012-10-27.

④ “Meles Zenawi’s letter to Obama on G8, G20 Summits: Wikileaks”, <http://danielberhane.com/2011/08/28/meles-zenawi-letter-to-obama-on-g8-g20-summits-wikileaks/>, 2012-10-29.

⑤ “Meles Calls for Fair Service from IMF and WB to Deal with Global Economic Crisis”, ERTA NEWS, 20 June 2012, <http://www.ertagov.com/erta/erta-news-archive/38-erta-tv-hot-news-addis-ababa-ethiopia/1774-meles-calls-for-fair-service-from-imf-and-wb-to-deal-with-global-economic-crisis.html>, 2012-10-29.

会，代表非洲国家阐述在气候问题上的一致立场。^① 由于埃塞俄比亚经常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维护非洲国际的利益和立场，英国首相戴维·卡梅隆（David Cameron）在缅怀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梅莱斯·泽纳维时称其为“非洲代言人”。^②

第三，尽力维系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早在非盟成立之前，埃塞俄比亚就积极参加联合国或非统组织框架下的非洲维和行动，派兵赴刚果（布）、乍得、卢旺达等国家执行维和使命。非盟成立之后借鉴了非统组织在维持非洲和平稳定方面的经验教训，将维护非洲的和平与安全作为其最重要的使命之一。而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埃塞俄比亚是非盟维和使命的主要贡献者之一。2003 年，为了监督布隆迪过渡政府和反政府组织对和平协议的遵守情况，维持布隆迪的安全形势，非盟成立了驻布隆迪特派团（African Union Mission in Burundi, AMIB），向布隆迪派遣了 3 000 多名非洲维和士兵。埃塞俄比亚为非盟驻布隆迪特派团提供了约 1/3 的兵力。^③ 由于缺乏兵力和后勤支持，非盟驻布隆迪特派团在解决布隆迪内部矛盾方面的作用比较有限。但是，非盟驻布隆迪特派团在客观上对布隆迪内战各方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大规模冲突的发生，为 2004 年联合国介入布隆迪维和行动创造了条件。非盟驻布隆迪特派团是由非洲国家在非盟框架内发起、筹划、和执行的第一个维和行动，象征着非盟迈出了自主执行维和使命的第一步。因此埃塞俄比亚在其中的贡献也有着特殊的里程碑意义。此外，埃塞俄比亚还参与了联合国在利比里亚部署的维和行动。截止 2009 年 11 月，埃塞俄比亚已经为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先后提供了 8 批维和士兵共 16 579 人次。^④ 埃塞俄比亚还是联合国非洲联盟达尔富尔混合特派团的第三大维和力量供应国。截止 2012 年 3 月，埃塞俄比亚为联合国非洲联盟达尔富尔混合特派团提供了超过 2 000 人次的维和部队（包括一个步兵营、一个运输连、一个工程连）和 5 架战术

^① P. K. Pachauri, *Dealing with Climate Change: Setting a Global Agenda for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New Delhi: The Energy and Resource Institute, TEIR Press, 2010, p. 146.

^② “Meles: The Voice of Africa”, Ethiopian Press Agency, 31 August 2012,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209030676.html>, 2012-10-29.

^③ “Ethiopia: Country Sends Peacekeeping Force to Troubled Burundi”, *Addis Tribune*, 8 October, 2003,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0310030768.html>, 2011-10-29.

^④ Tesfa-Alem Tekle, “Ethiopia Deploys over 3 000 Peacekeepers in Liberia, Darfur”, *Sudantribune*, November 19, 2009, <http://www.sudantribune.com/Ethiopia-to-deploy-over-3-000,39291,2012-10-29.html>.

埃塞俄比亚在推动非洲一体化中的作用

运输直升飞机。^① 随着埃塞俄比亚对联合国以及非盟维和行动支持力度的不断上升，埃塞俄比亚在勤维和人员数目也呈不断增长之势。联合国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埃塞俄比亚共有 5 274 名维和人员参与联合国的全球维和部署，在所有成员国中位列第四，在非洲国家中位居第一。^②

第四，参与与推动非洲区域一体化进程。埃塞俄比亚始终认同非洲团结是非洲人民最大的福音，并且也一直鼓励发展促进非洲团结的事业。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也坚持认为非洲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落后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是非洲一体化最大的挑战。因此，埃塞俄比亚主张通过加强非洲区域经济体的发展和建设，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未来实现非洲一体化的基石。在这方面，埃塞俄比亚也一直致力于强化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维护东北非地区的和平稳定，增进东非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为非洲一体化做准备。借助其在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内部的地位，埃塞俄比亚在组织框架内为维护东北非国家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10 年，在埃塞俄比亚和其他成员国的推动下，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两次召开首脑会议商讨索马里和苏丹两国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敦促苏丹政府贯彻《全面和平协议》并就南苏丹独立问题举行自由、公正的全民公投。此外，这两次峰会还呼吁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与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国家保持团结一致，致力于维护索马里的安全和稳定。^③ 虽然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已初步显示出它在东北非区域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框架性作用，但在跨国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的作用依旧非常有限。也正因此，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在其官方网站公布的埃塞俄比亚与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关系的文章中提到：“埃塞俄比亚认为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应该在它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績的重点领域上加倍努力。埃塞俄比亚热切希望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能够成长为构建统一非洲的最坚实的基石之一。……为实现这个理想，埃塞俄比亚政府和人民愿竭尽所能”。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还是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冲突预警和应对机制（Conflict Early Warning and Response Mechanism）

^① “UN – AU Mission in Sudan Honours Ethiopian Peacekeepers”，Tigray Online，March 05，2012，<http://www.tigrayonline.com/articles/article120317.html>，2012-10-29。

^② “Ranking of Military and Police Contributions to UN Operations”，United Nations Websites，September 30，2012，https://www.un.org/en/peacekeeping/contributors/2012/sept12_2.pdf，2012-10-27。

^③ “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on Development (IGAD)”，Official Website of th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http://meaindia.nic.in/staticfile/IGADoc2011.pdf>，2012-10-29。

的秘书处所在地。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梅莱斯自 2008 年开始直至于 2012 年因病去世，一直担任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的主席，统领该组织事务。

余 论

从早期泛非主义萌芽的思想与实践，到非统组织的从无到有，再发展到非盟，埃塞俄比亚在推动非洲一体化过程中功不可没。就一体化进程而言，一些学者认为欧盟是按照联邦制原则运行的典范，因而主张按照联邦主义精神推进非洲的一体化进程。^① 埃塞俄比亚的联邦制实践对非洲一体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联邦主义思想对非洲联盟和非洲一体化是有促进作用的，“非洲团结”的联合自强观念已经扎根于非洲人的心中，也许非洲主权国家在政治上的一体化在短期内还很难达到，但是作为非洲人民心中的渴望和行动，非洲团结已经成为非洲一切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出发点。^② 地区一体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区域内“核心国家”在一体化组织中的带头作用是一体化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其自身实力、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以及对地区共同发展的认同与忠诚，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地区一体化发展的形态、方式、进度及最终成就。区域内的核心国家能够带动区域市场的发展和协调成员国的行动和利益。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它们能够利用其相对强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来推动地区一体化组织的制度创新与发展，利用其在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领先地位和成熟经验来影响其他国家，并创造条件以克服地区一体化发展的若干制约与障碍。^③ 非洲是一个资源、人口和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地区，非洲一体化进程面临的困难和障碍之一就是缺乏推动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国家。但就各国在非洲一体化历史进程中的表现，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显示能力与发展潜力来看，埃塞俄比亚或许初步具备充当非洲一体化领头羊的主客观条件。当然，非洲大陆具有与欧洲、亚洲、美洲不同的特质，一体化进程亦与之不同，但区内国家的引领者定会成为加快地区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

^① Murray Forsyth, “Federalism, Nationality, Statehood: the Problem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Michael Burgess and John Pinder eds., *Multinational Feder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180 – 212.

^② Doudou Thiam, *The Foreign Policy of African States*, London: Phoenix House, 1965, p. 49.

^③ 罗建波著：《通向复兴之路：非盟与非洲一体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249 ~ 250 页。

The Contributions of Ethiopia in the Process of African Integration

Wang Yuhua & Pan Liang

Abstract: Ethiopia is the hosting country of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African Unity (OAU) and the African Union (AU). It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found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organizations. During the early phase of Pan – African movement in the African diasporas 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rea, Ethiopia w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Pan – African inspirations which were later to imprint a profound influence over the development of Pan – African movement. Ethiopia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the founding of the OAU in 1963 by mediating the disputes between the Casablanca group and the Monrovia group over the issue of African integration, and had since then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AU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spects as well as reg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lthough,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stature of Ethiopia in the process of African integration has shown a declining tendency as time goes by, Ethiopia remains an important supporter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frican Un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Generall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s of Ethiopia as well as the current one have all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OAU and later the AU, and have all,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OAU and the AU,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

Key Words: African Intergration; Ethiopia; Pan – Africanism; OAU; AU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